

别 好 诗 论



别 好 诗 论

王同书 著

新疆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晓敏

封面题字:田 原

别 好 诗 论

王同书 著

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4 号 邮编 830046)

新华书店经销

新疆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8.5 印张 227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7·5631—0219—1/G·124 定价:8.50 元

序

“别好诗论”是笔者对自己的特别爱好之诗的议论。

因为只是“自己的特别爱好”，所论专题、作家、作品，未必是文学史上重要问题，显赫人物，扛鼎之作。也因为此，论述不拘一格，行文不计长短，兴至命笔，兴尽即止。聊作铨次。是为阅读方便而已。

“自己的特别爱好”，当然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见“颦眉”叹其绝尘；窥“捧心”誉其风韵。全不察貂婵、杨妃之妒眼纷飞，更不思范蠡、夫差之千载定评。我只是骋我径寸翰，绘彼名花魂。好在作品早腾众口，随缘自有公论。

1993年4月于南京

目 录

不该淡忘的诗与不应渲染的风度	(1)
——张九龄其人其诗琐谈	
三环交织, 参攬推演	(14)
——《春江花月夜》(张若虚)新析	
谈《长恨歌》中叙述、描写与抒情	(22)
——兼论中国古典叙事诗的特点	
论《琵琶行》的意境	(31)
枯荷、夕阳、萧瑟美	(37)
——李义山诗特色别议	
冯延巳词散论	(45)
词苑国色, 哀歌绝唱(上)	(56)
——李煜词新论	
附 1: 说不尽“帘外雨潺潺”	
附 2: 看朱成碧思纷纷	
——《李煜〈捣练子〉词探胜》商榷	
论周邦彦词的独创性	(76)
万顷沧波没两鸥	(96)
——谈苏轼赠和子由的诗	
千古伤心淮海词	(106)
——秦观词散论	
论李清照词的意境	(117)

三千芥子多做了藏愁孔.....	(129)
——《耐庵遗曲》赏析	
一枝一叶见精神.....	(142)
——从金批《西厢》看金圣叹的反封建思想	
词苑国色,哀歌绝唱(下)	(164)
——纳兰词新论	
林黛玉诗词中的自我形象.....	(174)
在司空见惯的东西中发现出美来.....	(185)
——略论黄仲则诗的魅力	
江山如画,民不聊生	(197)
——论郑板桥关于农民的诗作	
清韵激昂,振聋发聩	(205)
——秋瑾诗巡礼	
疏钟红叶坠相思.....	(217)
——论苏曼殊诗	
一阳来复我吟诗.....	(229)
——读荒芜《纸壁斋集》	
说“绀弩体”.....	(235)
跋:诗词鉴赏初探	(243)

不该谈忘的诗与 不应渲染的风度

——张九龄其人其诗琐谈

一、张九龄其人其诗评价中的矛盾

张九龄在官场上是大人物，身为开元盛世一品官；在诗坛上是小人物，当代四卷本的中国文学史竟不提。尤其独特之处，是这位历史人物名垂后世的不是他的经天政绩，掷地诗文，而是他的“蕴藉”风度，高风千载盛传，故里妇孺皆知。其实，这些都是值得审视的认识。

《旧唐书》张九龄传记述张九龄的事迹计有八件：

一、任右拾遗时，上疏指责皇帝未行亲郊之礼。

二、主持吏部选拔人才，“前后数四，每称平允”，选拔出了大量合格人才。

三、反对任首相的同姓恩师张说荐人唯亲政策，张说不听，继续一意孤行，结果不但事发受责，张九龄也受了连累，迁为洪州都

督。

四、张说死后，九龄被任为相。

五、上书请斩安禄山，认为“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

六、不断受到“不学无术”的左丞相李林甫谗害。

七、罢相后，“宰执每荐引公卿，上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

八、荐周子谅为监察御史，周“妄陈休咎，上亲加诘问，令于朝堂决杀之，九龄坐引非其人，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

这八件事虽都是张九龄一生出处的行藏大节，但就其对于唐玄宗的直接影响来说，就其使唐玄宗产生“风度得如九龄否”良好的印象的事件来说，主要应是三件事，一是批评皇帝不行亲郊——不亲自主持祭祀事，二是因谏张说任人唯亲，不听，事发受累，毫无怨言事，三是识破安禄山，谏劝皇帝诛杀安禄山事，这三件事突出了张九龄为臣的两个特点：一是直言敢谏，一是任劳任怨，集中于“风度得如九龄否”这句由皇帝亲口说出的视为群臣楷模的赞语中。此外，《旧唐书》更有几句《新唐书》所没有的极重要的文字。《旧唐书》在叙述他误荐劣臣被贬后，曾写出张九龄的平时为人：

性颇躁急，动辄忿詈，议者以此少之。

说他是个非同一般的急性子，不但经常发脾气，而且动不动就要骂人。这究竟如何，当然不应轻信。但这史料的可信程度绝不比说皇帝赞扬他独具风度，并以他的风度作为以后选相的标准——那些史料，那些说法低！

再说他的诗，早在唐朝当时就已有不同的评论。如对张九龄一生升沉、有重大影响的张说，称他为“后出词人之冠。”认为他是领袖风骚的人物，另一方面又在与徐坚谈论时说他“文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边幅。”（《新唐书·文艺传上》）缺少开阔的思路，纵横的气势，似乎又不能算“词人之冠”了，而僧皎然作《诗式》，纵览唐诗盛况，说张“诗歌居上游”（《唐诗纪事》卷一五）。《唐诗三百

首》中，张九龄的诗列为开篇之作。在六十年代前期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竟一字不提，近年来出版的，《唐诗鉴赏词典序言》中张九龄同样成为被遗忘的名字！对张九龄其人其诗，千载而下都有如此差异的认识，实在令人深思。

二、关于九龄风度

所谓“九龄风度”的提出是唐玄宗在张九龄被罢相后，在大臣推荐内阁宰相人选时说出的，很显然不是张九龄待人接物——对待上、中、下、三层人物态度的总概括，而是对张九龄与上层人物，尤其是与皇帝的接触往来态度的概括。

张九龄从政为相做得最多的是陪皇帝去各地行走所写的应制诗。张九龄是位应制诗写得最多的作家，这些应制诗最突出的内容是颂赞皇帝圣明动天。

四郊愆阳，我后其勤。（《奉和圣制烛龙斋祭》）

何以致之？我后之感。（《奉和圣制喜雨》）

在盛暑中大家抱怨“赤日炎炎似火烧”时，“圣主”只是辛勤地祈求上天，因而终使上帝感动下了时雨。对这位声色之徒竟说成是：

尊祖实我皇，天文皆仰观。

真可谓不怕脸红。张九龄最令皇帝感动不已的是史料所载前举的三件大事中所表现的态度。同时，《新唐书》还记有谏劝牛仙客为相、谏劝废太子两件违逆皇帝心意的事，其中所示对皇帝的态度也大致同于《旧唐书》。

批评不亲自主持郊祭的“非礼”行为，在现在看来，这也不算一件大事，但当时在本传中不但被列为第一要闻，写了下来；而且录登了谏劝文章，可见重视；更可见重视的不仅在于这件事，也在于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精采之处是不但引经据典批评得在理，而且言

辞恳切，陈述得切情。——这正是九龄风度的第一个重要方面，不是得理不让人的咄咄逼人，而是达理通情，融情入理，以情行理。

张九龄建议诛杀可能要谋反的逆臣，正是当时受到皇帝、权臣宠爱的将军。这建议非同小可！安禄山是扰乱唐朝江山的野心家，也是极为狡诈的骗子，他高超的欺骗技术，竟使开创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昏昏然，真是一只不能拔胡须的老虎。然而张九龄敢拔，表现了张九龄的胆识，当然要引起皇帝的震动。玄宗没有听他的话，（当时也不可能听他的话！）但张九龄的严正判断，不顾个人安危的政治品质不能不使唐玄宗内心震动。尤其是“数言之”这几个字，表现出张九龄对重大政治问题反复不断地表示自己意见的态度——这两点：清醒的政治头脑，执着地坚持自己的看法，正是张九龄风度第二方面的重要内容。

第三方面是被罢相后表现，这在诗中表露得最多。《杂诗五首》其一；

孤桐亦胡为，百尺傍无枝。疏阴不自复，修干欲何施。

高岗地复回，弱植风屡吹。凡鸟已相噪，凤凰安得知。

张九龄受李林甫的排挤、陷害罢官，是与屈原所说“众女嫉余之蛾眉兮”一样的悲剧。张九龄却并无屈原“荃不察余之衷情兮，反信谗而齌怒”的指责，相反，只说凡鸟乱噪，凤凰不知，他甚至对不公正的对待，巨大的是非颠倒表示：

悠悠天地间，委顺无不乐。（《杂诗》之二）

这种受贬无怨的态度，当然也是皇帝欣赏的九龄风度的第三个重要方面。

这三方面表明张九龄对皇帝的态度：受宠时谦恭陈情，见外孜孜述义，被贬时善为开脱。真是一位打起灯笼也难找的忠实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人。唐玄宗常自以为自己不亚于乃祖李世民，他的上台也与李世民的宫廷政变方式有惊人的相似，他当然注意选择宰相。九龄以前的名臣，辅佐太宗成就贞观之治的魏征，对太宗忠诚不亚

于九龄，但是威慑人主的力量太大，不驯服。他那面“镜子”不时要照出人主的不正嘴脸；李林甫等媚态甚于九龄，但不忠诚，他那面“镜子”照不出嘴脸；而张九龄则既有魏征忠诚，也有李林甫恭顺，他那面“镜子”选的总是最佳角度！总能照出人主的“美”处！——这就是唐玄宗欣赏、要求“九龄风度”的内心隐衷。

所以，“九龄风度”其实是统治者所提倡的顺从观念——仆从哲学在人的仪态乃至心态上的要求，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平等待人讲求礼貌的要求。

张九龄 62 岁以后方位极人臣，宦海浮沉使他积蓄了若干护身解数，尤其是为相后处于聪明、爱才，虽少廉耻、却不刚愎；虽有知遇，却不放手；虽无害张之言、却有灭族之鳞的唐玄宗手下，又处于李林甫——有名的“口蜜腹剑”的阴谋专家的牵制之下；社会上流行的儒学道化，儒道互补的思想也不时影响着他，他在困难时自然会说出：

道家贵至亲，儒生何固穷。（《杂诗》）之五

追求自我原谅、自我解脱、自我支持的哲理。所以九龄风度又是具有深刻历史根源、思想根源、个人气质的非同一般的封建仪态规范，它只是昙花一现。以后历史上不乏优秀的帝王，也不乏杰出的贤相，而张九龄那样的人，九龄风度却再也没有现过。当然，现在欣赏九龄风度的人，并不同于玄宗的欣赏内容，更多的只是欣赏待人接物中一种谦和态度，一种对事物、特别是对逆境处之泰然、善于作辩证分析的思想境界。这其实是与历史上的九龄风度无多形似，更多神非的东西，不必仍归于九龄名下，更不必信口提倡。

三、关于九龄的诗

张九龄的山水田园诗属于“无我”诗境，有清淡悠远的丰神，远承陶谢，下启盛唐。名句：“云间目孤秀，山下面清深，萝茑自为幄，

风泉何必琴。”(《始兴南山下…》)“溪流清且深,松石复阴临。”(《初发曲江溪中》)“树晚犹葱茜,江寒尚渺弥。土风从荆别,山水入湘奇。石濑相奔融,烟林更蔽亏。层崖夹洞浦,轻舸泛澄漪。松筱行皆傍。禽鸟动辄随。”虽对自然美的形与神也注意作质朴、准确的刻划,但比起前代谢灵运、陶渊明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中饶霜露,风气已先寒”、“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阴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很显然是并未有所超越的。而张九龄距离陶渊明时间已过去三百年,诗却未能向前跨一步。

张九龄的人生感慨诗“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虽对自己的违心逆意,人世的是非颠倒,人生的难以把握有所思考,但比前代曹操的“烈士暮年,壮心未已”,鲍照“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忧愤未更深广。由此看来,张说的“当为词人之冠”说法,僧皎然的“上游”论断,是很难令人感到符合实际的。应该说,过去对张九龄诗的抬高评论的出发点是从儒家诗关教化的功利观点,是从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甚而诗以人贵的流传观念出发的,从被认为比较中肯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看:

九龄守正嫉邪,以道匡弼,称开元贤相。而文章高雅,亦不在燕许(张说、苏颋)诸人下。《新唐书·文艺传》载徐坚之言,谓其文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边幅。今观其《感遇》诸作,神味超轶,可与陈子昂方驾,文笔宏博典实,有垂绅正笏气象,亦具见大雅之遗。坚局于当时风气,以富艳求之,不足以为定论。

从人说到文,从文说到诗,并且与同时代人诗文比较,看似比空洞的凭感觉而作的褒贬要切合实际,但从其“垂绅正笏气象”、“大雅之遗”的标准和认识,可见仍以儒家功利观念为指导。而当代贬低者也无一例外都是从社会学观点——新的功利观念出发,从

唐诗高峰来观照，从诗的内容、题材的广度、深度来评说，特别是受了韩愈的“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元遗山的“合着黄金铸子昂”说法影响而形成的，所以是似新而实旧的观点。

对于张九龄的评价首先要突破齐梁——陈子昂——李杜的旧框子。

就唐诗的发展过程看，并非齐梁浮艳——王杨余绪——子昂高古——李杜汪洋，这种垂直的或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样式，而是绮丽与质朴两种风格、追求声韵格律与追求自然高古两种形式，虽有交叉却基本平行的发展样式：

(绮丽)齐梁——王杨——沈宋 杜甫(格律诗派)

九龄

(质朴)渊明——子昂——孟王 李白(高古诗派)

这个发展样式最后以李白、九龄、杜甫三角形为终点。所以，所谓齐梁——陈子昂——李杜的单线发展模式其实是不存在的，也就不存在什么子昂高、沈宋低的问题，也不存在什么子昂低、杜甫高的问题。追求不同艺术风格，致力不同的艺术形式是不好类比的。而由于唐朝著名诗人大多以儒家思想指导为人、为文、为诗，他们的评论，如李白“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杜甫的“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虽然不但符合当时诗歌发展的真实风貌、美学观点的真实转移，而且也不符合他们自己的创作实际与美学追求。我们本应从作品实际出发，从作品美学意识表现出发，作出正确的概括，但因为儒家功利观念与我们长期以来所持的社会学观点如此易于合拍，导致我们轻易地沿着他们的观点延伸，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同时也不能不说是亟待反思的认识。其次，在旧说的初唐浮艳(曾被指为反现实主义)诗风与盛唐雄健(曾被指为现实主义)诗风之间有一大批诗风各异的诗人，其中最重要者年龄大致区别如下：

王勃 650—676

宋之问 656?—712

沈佺期 656—714?

陈子昂 661—702

贺知章 659—744

张九龄 673—740

王之涣 688—742

孟浩然 689—740

李 颀 690?—751

王昌龄 698—757

王 维 701—761

李 白 701—762

从这张年龄表来看,张九龄生当初唐四杰代表作家王勃去世之后,卒于唐诗两座高峰之一的李白进入长安(742)之前,是从初唐到盛唐的近五十年的蜕变时期的贯通人物。他比陈子昂小12岁,却比他迟死近40年。与山水田园诗派代表诗人孟浩然、王维同时代而略长,与边塞诗派前期代表王之涣、李颀、王昌龄也同时代而略长,所以政治家而兼诗人的张九龄实是当时诗坛的轴心。

《旧唐书·文苑传》、《新唐书·文艺传》记载有招用孟浩然、擢拔王维的经过;735年成进士的李颀也正是张九龄执政时的才人;《李泌传》、《文苑英华》、《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纪》还提到张九龄奖饰诗人李泌、卢象、皇甫冉的情况。可见张九龄实际上还是一位诗坛的强有力的组织者。前人认为张九龄是陈子昂到盛唐之间的“桥梁”是不太确切的。张九龄实际上是盛唐诗、诗的盛唐气象创造者的领班。

第三、张九龄的诗,就内容和题材看,大致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写国家大事的应制诗,一部分是写自己生活遭际的抒情诗。其中应制诗有三四十首之多,过去一般论家多置之不论,只论其抒情诗,抒情诗中又集中论其《感遇》诗,这也又都是比较片面的。张九龄的

应制诗不仅数量多，而且也很有特色，并非只是肉麻的吹捧，或毫无感情、毫无形象的说教，而有不少是富于个性的、含义深长的诗谏草。试比较一下过晋名将王浚墓时玄宗与九龄所写的诗便可看出：

吴国分牛斗，晋室命龙骧。受任敌已消灭，策勋名不彰。居美未尽善，矜功徒自伤。长戟今何在，孤坟此路傍。不观松柏茂，空余荆棘场。叹嗟悬剑陇，谁识梦刀祥。

——玄宗《过王浚墓》

汉王思逐鹿，晋将在弘农。入蜀举长标，平吴成大功。与浑虽不协，归浩实为雄。孤绩逾千载，流名感圣衷。万乘度荒陇，一顾凛生风。古节犹不弃，今人争效忠。

——张九龄《奉和圣制过王浚墓》

张九龄的诗比玄宗的不同处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对王浚的评价。玄宗列举旧史，批评王浚“矜功自伤”，基本上持贬多于褒的态度。九龄却从大节着眼，作了热情的肯定，评为“英雄”。这无疑是正确的。二是正确评价古人、吊唁前贤的目的。玄宗只是一般的以人生空虚感慨为主要的抒发。九龄则提出为了现在，为了激励今人“效忠”事业，这也无疑是正确的。同时九龄面对的是皇帝圣制，竟敢如此大唱反调，又无疑是极有胆识的表现。半个世纪以后号称“鬼才”的李贺途经王浚墓也写了《王浚墓下作》，诗云：“人间无阿童，犹唱水中龙。白草侵烟死，秋藜绕地红。古书平黑石，神剑断青铜。……”只就墓地荒凉，发抒一些人生短暂无常感慨，就其深度也是不及张九龄的。

就张九龄的抒情诗看，学被认为代表作的《感遇》诗，其实并不比陈子昂的《感遇》诗好，青出于蓝，并不胜蓝；而其抒述怀乡、思亲的诗，倒有些十分精采的好诗。如脍炙人口《望月怀远》诗：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这首诗将月，这个自然界中最富于诗情形象，它的引人回味、引人神驰万里的特点写得饱满、充分而又自然、朴素。不象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那么排宕、流转，但也不乏其缠绵；不象杜甫《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那么婉曲、细致，但也不乏其深情。

这首诗也体现出了张九龄善于在平淡的生活现象中提炼出朴素诗情的艺术特点。“海上生明月”文句平淡、自然，只是一种常见现象的叙述，并无情感的悸动，但接上“天涯共此时”就使这叙事之句忽然充满激情。它不仅联系到自己的所思，有了情；而且也拓展到读者与各自的所思，情满纸外。这是对环境——眼前景物的提炼。下面就情人（有情的人）行动来描绘，用在月光刺激下展转反侧、坐卧不宁刻划怀念之长之深。这些动作分开来看又都是人所常有；串连在一起，一个对外界非常敏感、对所怀非常诚挚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了，对所怀眷念之情也就喷涌而出了。这是就人物行动——抒情方式的提炼。善于捕捉环境中朴素美，善于集中人物行动中的激荡点，正是张九龄这首诗的特点。

第四，张九龄的诗，就其美学特征看，可以概括为质朴。谈论张九龄的有一个不应忽略而又长期被忽略的问题：九龄诗与文的关系。九龄的奏疏在号称“燕许大手笔”的张说、苏頲散文笼罩下是别具一格的，写得极为简质，有的简直就象电报体，如《奏救太子》、《奏劾林甫》、《奏劝侍中不可赏功》都只是寥寥的一两句；但又总蕴蓄着强烈的深情，有着强烈的诗美，如谏阻张说任人唯亲错误的《上张燕公书》：

官爵者，天下之公器也，德望为先，勋旧次焉，若颠倒衣裳，则讥谤起矣！今登封沛泽，千载一时，而清流高品不沾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散，但恐制出之日，四方失望！兹进草之际，事犹可改。唯令公审筹之，无贻后悔也。

既正气凛然又深情婉转。他的诗与奏章非常一致：简质而深情。这个简朴美贯串于张九龄的全部诗文，应该承认是张九龄自觉的追求。它与当时以排宕纵横为特征的“燕许大手笔”——散文界的美学意识，与当时齐梁余绪铺陈描写“浮艳”诗风——诗界美学意识，分庭抗礼，各有千秋。而因九龄的特殊政治地位的短暂，所以其深刻影响虽直至南宋，而在当时却没有形成巨大的流行热，反而引起“窘边幅”的批评，这似乎是不公正的。

张九龄是盛唐诗人的主心骨，粘合剂，他的人、他的诗的价值在波澜壮阔的唐诗洪涛中是一段伏流，从进行中是不易看清的，但如抽出这一段，便立刻会看到巨大的空缺。而且这空缺不仅陈子昂补不上，即使是号称盛唐三大家的王维也不能填补，这就是他的诗不应该忘的原因。

四、“九龄风度”对诗的渗透、束缚

张九龄去世后三年，李白进入长安，好象在长安诗坛乃至整个唐朝诗坛投进一颗重磅炸弹，发生了强烈的冲击波，唐诗出现了全面突破的景象。题材、方法、诗体、声律都有新的变化。其实，从前面诗人年龄表已经看到，早在九龄生前盛唐时期两个主要流派，以王维、孟浩然为首的山水田园诗派，以王之涣、王昌龄、李颀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已开始形成，并且已卫星般聚集于张九龄周围，急待组织、引导。作为盛唐诗人、盛唐诗歌的三种主要意识：主体精神、创造精神、批判精神虽未上升到社会流行意识，但不仅已萌芽发生，而且已显示出强烈的趋势，而作为政坛、诗坛领袖的张九龄却既没有向哪一派靠拢，也没有在剧荡的时代变革中，特别在自己政治生涯的两度浮沉中突破自己！他始终沿着儒家诗教做人、作诗，甘居配角地位，陈述“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感叹“凡鸟已相噪，凤凰安得知”，梦想“庭前揽芳蕙，江上托微波”，缺乏创造精神，迴避